

话说中国

百年记忆

卷三

主 编 李 诚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
中国政治舞台进入新阶段	(1)
毛泽东从实践中得到锻炼	(9)
各地党的早期领导人	(19)
一大陈独秀当选书记	(37)
国共合作开创国民革命	(46)
孙中山离开广州	(46)
陈炯明由后台跳到前台	(52)
孙中山的“北伐梦”	(63)
陈炯明兵变	(70)
蒋介石在广东起家	(76)
腥风血雨中建立的蒋家王朝	(88)
蒋介石双喜临门：美人与权力	(88)
张作霖被换马已势在必行	(100)
日本人放弃了张作霖，东北问题是个隐患	(104)
国民党三大：蒋家天下陈家党	(109)
蒋介石削藩	(114)
蒋、冯中原大战	(121)

黄埔建军	(129)
南昌起义, 打向反动派的第一枪	(145)
南昌起义	(145)
南昌起义造就的中共领导人	(150)
蒋介石的认识	(156)
中共和蒋介石各请军事顾问	(161)
五四运动的回忆	(169)
回忆李大钊先生	(180)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中国政治舞台进入新阶段

陈独秀从北京逃到上海后，上海便成了南方共产主义的中心。

上海当时宣传社会主义影响较大的有三股力量：一是陈独秀领导的新青年社；二是国民党创办的星期评论社、觉悟社。星期评论社出版《星期评论》原刊，编辑是戴季陶、沈玄庐和李汉俊，撰稿人有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觉悟社出版《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是清末举人、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左派邵力子；三是研究系张东荪等人组织的共学社，出版《时事新报》。

三股力量在宣传社会主义方面建立了联系，陈独秀的住所变得热闹起来。经常坐黄包车来的是《国民日报》经理兼总编、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邵力子住在法租界，离陈独秀的住所不远。陈独秀在《觉悟》的上发表过文章，与邵力子是“文友”。

住在三益里 17 号的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也是陈独秀家的常客。李书城是老革命党人，同盟会发起人之一，对军阀混战和国民党退让深感失望，与外界往来甚少，整天在家看书，但对陈独秀颇友好。比李书城小 9 岁的李汉俊，12 岁东渡日本留学。他极为聪明，不仅日语讲得很好，而且精通英语、德语、法语。他在日本拜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学教授河上肇为师，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精通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与陈独秀自然是志同道合。

不论是陈独秀、戴季陶，也不论是邵力子、李书城，都曾在日本留学，程度不同地都懂得些马克思的学说。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已成新潮。1919 年 8 月，年仅 19 岁的张闻天，竟在《南京学生联合日刊》上发表《社会问题》一文，文末节录了《共产党宣言》第 2 章的 10 条纲领。然而，《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由于翻译难度大，一直没有人能够完成。

戴季陶是较早筹划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的人。他把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带回国内，曾想翻译它，但细细看后，便放下了，翻此书不但要有相当高的中文修养，而且要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戴季陶打算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共产党宣言》，便着手物色合适的译者。

邵力子向戴季陶举荐一个人，即杭州的陈望道。

陈望道是浙江义乌人，中学毕业后到上海进修英语，准备去欧美留学。但未能去欧美，却去了日本。他在日本

主攻法律，兼学经济、物理、数学、哲学、文学。1919年5月回到杭州，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当语文教师。他常为《国民日报》副刊《觉悟》撰稿，成为邵力子的密友。

陈望道与浙江第一师范语文教师夏丐尊、刘大白等倡导新文学、白话文，人称“四大金刚”。戴季陶给陈望道寄去了日文版《共产党宣言》，还寄去了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作为翻译时对照之用。这本英文版是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弄来的。陈望道带着这两本《共产党宣言》和《日汉辞典》、《英汉辞典》回到义乌县农村的家里，躲进柴屋，搭起铺板作书桌，又找来一盏油灯，日夜不停地翻译起来。

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译完《共产党宣言》寄给戴季陶。这时，他接到《星期评论》编辑部邀请他到上海担任编辑的信，便提着皮箱来到上海。

《共产党宣言》译文连同日文、英文版，已交给了李汉俊，由李汉俊和陈独秀校阅译文。陈望道住进了三益里《星期评论》编辑部，即李汉俊的家里。

陈独秀和李汉俊校阅了《共产党宣言》，再经陈望道改定，准备发表，这时突然发生意外，《星期评论》被当局查禁而停刊。陈独秀邀请陈望道来渔阳里2号，编辑《新青年》。于是，陈望道便成了陈独秀的助手。

公开出版《共产党宣言》可能会有麻烦，陈独秀决定出版单行本。初版《共产党宣言》单行本印了1000册，不胫而走，紧接着又印了1000册。

成立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必然产物。李大钊在用骡车护送陈独秀离京南下时，两人在途中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当时只是提出北京由李大钊负责，上海由陈独秀负责。从此，他们两个各自留心，物色人物，创建共产党。

李大钊在天津送走陈独秀之后，没有立即回北京，他在天津设法与苏俄友人取得联系。他和“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南开中学学监姜般若、南开中学学生胡维宪等一起到天津原帝俄租界，会见苏俄友人伯特曼，相互交谈了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伯特曼是苏联共产党派来了解中国情况的。由于敌人监视甚严，他们的会见被密探发觉。次日，天津《益世报》上登出。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急忙通知与会者注意防范，随后即搭车返回北京。

李大钊和伯特曼交谈的情况，很快传到了苏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

3月，俄共远东局维金斯基率代表团来华，列宁对代表团下达3项任务：

（1）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

（2）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

（3）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俄国游历。

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有库兹涅佐娃（维经斯基的妻子），

马马耶夫和妻子马马耶娃以及翻译杨明斋。杨明斋是山东省乎度，他童年入私塾，16岁因家贫而失学务农，不久成了亲，19岁那年，妻子病逝。村里有人去闯俄罗斯，他在苦闷之中，便随人去海参崴。海参崴原本是大清帝国的领土，1860年，沙俄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不平等的《北京条约》，从此那里便成了俄国的领地，并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控制东方”。因为那里原是中国领土，居民中有1/3是华人。杨明斋在那里一边做工，一边学习俄语。以后又进西伯利亚做工，并参加俄国工人运动，加入布尔什维克。

十月革命后，杨明斋组织华工参加红军。不久，他被派往海参崴，公开身份是华侨联合会负责人，做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当时海参崴还在日本占领之下。1919年秋冬，海参崴被苏联红军占领。

俄共远东地区委员会向俄共中央报告，成立俄共远东局，作为俄共专门负责同远东各国革命者联系的机构。1920年3月，俄共在海参崴成立分局，要求海参崴分局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杨明斋因而被选人代表团。

5位代表成员于4月抵达北京，首先结识了李大钊，经过多次交谈，表示愿意帮助中国成立共产党。李大钊向他们推荐了陈独秀，并给他们写了一封介绍信。

4月的一天，陈独秀在寓所里，正在给李大钊写信商讨有关建党的事，突然妻子高君曼通报道：

“仲甫，有一男一女两位俄国人和一个中国人，说是

从北京特地来拜访你的。”三位客人一走进门来，那位个子高、鼻子大、卷头发的俄国男人，忙递给陈独秀一封**信**。陈独秀凭那信封上刚劲有力而熟悉的笔迹，判定这是李大钊的亲笔信。他拆开一看，果然是李大钊的引荐信。顿时，脸上露出了笑容。

杨明斋向独秀介绍说：“维金斯基一行在北京访问，通过在北大任教的两位俄籍教授，结识了李大钊先生，经过多次恳切交谈，他们表示要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所以，维金斯基的秘书马马耶夫及其夫人萨赫雅诺娃留在北京，协助李大钊先生在北方建党，今又介绍维金斯基及其夫人来上海访问陈先生，了解上海建党的情况。”

陈独秀高兴地说：“我同李大钊相约，南北方联手共建中国共产党，你们来访正是求之不得。”

维金斯基说：“希望陈先生在上海，像李先生在北京一样，尽快着手在南方建党。”

陈独秀这次同维金斯基见面，加快了在上海及至南方建党的步伐。接着，他又介绍维金斯基会见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张东荪、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举行多次座谈会，了解中国情况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情况，商讨发起建立共产党的问题，那时，这批思想激进活跃的知识分子，大都住在法租界，一有人招呼，便聚集在一起，热烈交谈讨论，边谈边讨论，越感到中国有组织共产党的必要。

5月的一天，陈独秀见时机成熟，便秘密召集沈雁冰、

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戴季陶、张东荪等开会。他开宗明义地说：“守常在北京已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我们也不能落后。我提议，上海是不是先组织一个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共产党的建立作好组织准备，你们意见如何？”

众人一致赞同，这也是众人所愿。陈独秀被推选为研究会的负责人。

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历史巨人，一南一北相继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历史的进程中，已成了共产党发起组织的前身。中国共产党的组建，是中国社会矛盾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的自觉要求与行动，因而筹建进程日益加快。到了6月中旬，天气渐热，人心更热，形势需要，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开会，正式筹备成立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起草党纲十余条，提出“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

8月的一天，天气酷热，陈独秀渔阳里的寓所门窗却紧闭着，这里正在举行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会议。参加发起的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当时在日本）、杨明斋和李达，众人一致推选陈独秀担任书记，由于他在当时的声誉，决定由他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这次会议，共产国际代表吴延康也参加了，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

上海发起组成立后，陈独秀约李大钊在北京组织，通过国民党人、山东省议会秘书长、曾经销《新青年》的王

乐平，约常去购阅《新青年》的王尽美和邓恩铭在济南组织，约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武汉组织除陈独秀派刘伯垂去外，李汉俊也去做了工作。这样，上海的。组织事实上成了一个总部，各地组织是支部。组织名称开始叫“社会党”，陈独秀致函李大钊，询问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李、张商量后明确回答：“共产国际的意思是‘就叫共产党’。”

“好！叫共产党就叫共产党，旗帜鲜明，中国要走俄国革命道路！”陈独秀接到李大钊复信后，高兴地说。

8月底，来上海躲避北京反动势力麻烦的张国焘，在陈独秀家里住了近一个月，由沪返回北京。陈独秀要他将上海的建党意见转告李大钊，即“上海小组将负责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展”，希望李大钊“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李大钊听了张国杰的转达意见后，略经考虑，即无保留的表示赞成，认为上海所拟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从此，南陈北李高举大旗，携手创建中国共产党，共写“开天辟地”的雄文。

在南陈北李两只巨手推动之下，建党工作进展迅速，到了1921年初，除担负临时中央任务的上海发起组外，有北京、武汉、长沙、广州和济南等五个支部，先后相继成立。后不久，北方数省和内蒙地区的党组织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之下，也纷纷建立起来。

陈独秀在筹建共产党时，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但著作的中文译本太缺乏了。为此，1920年初他亲自抓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工作，他委托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早期著作《阶级斗争》、李汉俊翻译了介绍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一书。11月，又出版了新青年丛书第一种，即李季译的柯卡普《社会主义史》。这些著作，在社会各阶层的底下秘密流传，到处被人传阅，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对创建中国共产党以及对于共产党员及青年团员确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起了极大的作用。后来，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还谈到当时“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

毛泽东从实践中得到锻炼

1914年至1918年上半年，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受到新文化运动新思潮的深刻影响，成为一个坚定的激进民主主义者。1918年4月14日，他和志趣相投的朋友蔡和森、肖子升等人发起成立新民学会。1919年，毛泽东在长沙领导了湖南民众的爱国运动。在这段时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进行了积极认真的探索。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成立的第一个团体新民学会，在

较长一段时间里，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团体。

新民学会的酝酿，“远在民国四五两年”，即 1915 到 1916 年期间。毛泽东、肖子升、蔡和森等志同道合的朋友 15 人左右，围绕人生观、社会历史观进行了 100 多次极其频繁的讨论。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讨论的结果，是把个人的改造和人类的改造，归结为“自己品行要改造，学问要进步”；方法是将“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改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通过“求友互助”达到创造新民和新生活目的。

毛泽东读书期间，湖南督军是张敬尧，张敬尧统治湖南，罪行累累。湖南人把和他的前任督军汤梦铭并称为“汤屠”、“张毒”。他在湘统治期间，刮削湘民膏脂，掠夺土地等，罪大恶极，湖南人民无不切齿痛恨。

1919 年 12 月 2 日，长沙各校数千人焚毁日货，举行游街大会。张敬尧之弟张敬汤，率兵强行驱赶学生，打伤学生多人，逮捕五人，并辱骂学生是土匪，谓“当痛剿”，激起学生的无比愤怒。长沙学生决定罢学，揭起驱张旗帜，宣布：“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回校！时日局丧，誓与偕亡！”

毛泽东领导驱张运动，组织教育界、商界支持学生正义行动。他指派学联骨干分子，赴湖南各地发动罢课，声援长沙学生。他和彭璜等领导新民学会和学联，组成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郴州、常德等地开展请愿活动，揭露张敬尧罪恶行径，掀起声势浩大的驱

张运动。

12月上旬，毛泽东率领赴北京驱张代表团出发。途经武汉，在汉口毛泽东亲自草拟《驱张宣言》，向全国慷慨陈辞，全面揭露张敬尧的罪恶。

18日，毛泽东率领驱张请愿团到达北京。他和各界立即研究驱张办法，决定统一湖南在京各种驱张组织的行动。

为揭露张敬尧的罪行和扩大驱张运动，“旅京公民毛泽东、张百龄等”，“组织平民通讯社，每日发出稿件百五十余分，送登京、津、沪、汉各报”。毛泽东亲自草拟的平民通讯社稿件15件。

湖南驱张代表团在北京造成浩大声势。北京各界群众及舆论界纷纷支持湖南人民正义行动。毛泽东等代表不畏艰险，为民请命，奔走呼号，呕心沥血，其事迹传颂一时，声名大噪，为各界所认识。

正当驱张运动继续深入之际，军阀之间内讧爆发，吴佩孚的北军从湖南撤防，谭延闿的湖南军乘机进入湖南。6月11日，张敬尧由长沙败走岳州，6月26日又退出岳州。接着张敬尧被北洋政府宣布撤职查办。9月11日，其弟张敬汤在湖南被高等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至此，湖南驱张运动告一段落。

驱张运动是一次和平请愿活动，并没有超越毛泽东过去主张的“温和革命”、“无血革命”和“呼声革命”的范围，它的最后胜利，显然也不是“呼声革命”的胜利，而

是军阀内讧之使然。但是，驱张运动对于毛泽东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转变，却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新民学会会员对毛泽东和蔡和森有一个比较，毛泽东是一个实践家，蔡和森是一个理论家。说毛泽东是一个实践家，并不是说他轻视理论，只知实践。而是说，他获得了某种理论便总要拿去实践。毛泽东对理论的热心，并不亚于蔡和森。他总是以探索真理为依归，对理论表现出极大的热忱。这一时期也是他在理论上“脱毛”的时期。

新民学会成立不久，蔡元培、李石曾等便发起留法勤工俭学活动。1918年6月下旬，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等在第一师范附小开会，集中讨论“会友向外发展”问题，一致认为湖南政局极乱，教育摧残殆尽，几无学可求，“对于留法运动认为必要，应尽力进行”。会后，蔡和森于6月23日离开长沙，25日到达北京，具体联系留法勤工俭学事宜。他具体与蔡元培、李石曾接洽，又与湖南籍名流章士钊、熊希龄接洽，请其设法支持。8月19日，毛泽东等25人也到达北京。1919年11月25日，蔡和森同母亲及向警予、蔡畅等乘船赴巴黎。毛泽东决定暂不出国，留在国内对国情作调查研究。

中共和国民党早期的领导人，如蒋介石、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都曾出国留洋。中共早期还有一批领导人则是到俄国学习。在这种大环境下的毛泽东，却独独一人留在中国，土生土长，这对他后来的影响是巨大的。

1920年2月2日，蔡和森抵达巴黎。随后住到近郊的

蒙达尔尼公学。因水土不服，上吐下泻。他为了寻求革命真理，决定不上课，“惟手字典一册，报纸两页”，“以蜚看报章杂志为事”。每天看《人道报》、《共产党人刊》、《俄事评论》等，共产主义知识大增猛进。5月28日，他从巴黎给长沙的毛泽东发出第一封信，开始了“巴黎——长沙”的共产主义思想讨论和建党问题的讨论。

蔡和森给毛泽东的第一封信，被毛泽东标以“研究社会主义”的！小标题，收入《新民学会通讯集》第三集，作为首封刊出。毛泽东在本集提要中注明：“这一集以讨论‘共产主义’和‘会务’为两个重要点。信的封数不多，而颇有精义。”

在信中，蔡和森告诉毛泽东他在法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打算：“我在法大约顿五年，开首一年不活动，专把法文弄清，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以及国际共产党，尽先弄个明白。一面将社会，工团，无政府，德漠格拉西（基尔特社会主义，即纵〔综〕合此四者而成一调和，近德国多数社会党，显然立足于二个主义之上（社会主义与德漠克拉西），以与中产阶级联盟，加番研究。”其时，蔡和森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情况，还缺乏明晰的了解，他把弄清这一问题作为第一要务。这与毛泽东当时对于种种主义，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吸取精华，使它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的情况和想法大致相同。

不过，蔡和森和毛泽东的条件毕竟大不相同。法国是一个社会主义思潮云涌的地方，蔡和森以勇猛精进的精神，短时间便收集了上百种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和小册子，并且择其急需者“猛看猛译”。

7月5日，新民学会在法会员13人，齐集蒙达尔尼公学，6日至10日召开了五天会。一些外省的工学励进会会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和森主张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其主旨与方法多倾向于现在之俄。”由于蔡和森的多方努力，全体会员一致同意改变学会成立时确定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宗旨，一致造成把“改造中国与世界”确定为学会的根本方针。但是，多数会员对蔡和森提出立即建立共产党，走俄式革命道路还难以接受。

毛泽东这时的思想大致和在法多数会员的思想相同。他在北京阅读了不少有关介绍共产主义的书报杂志，在上海又和陈独秀进行了关于共产主义的谈话，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像俄国那样“彻底的总革命”，他也赞成，但认为现在实行还“不行”。他的思想发展还稍落于蔡和森。

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再次与毛泽东通信，交换他对共产主义和建党的认识。蔡和森在这封信中详细谈了对一系列关系革命成败的根本指导思想。

1920年9月中旬，肖子升启程回国。16日，蔡和森再与毛泽东一封信，着重谈在国内建党问题，托肖子升带